

# 「春風風人，夏雨雨人」

章君毅

寫在胡適之先生逝世六周年紀念日

「中外雜誌」想一連串的登些學問德行都有

特殊表現的近代人物青年時期事迹，頭一篇便選中了胡適之先生「四十自述」裏的兩段，「在上海（二）」與「我怎樣到外國去」，承編者先生幾度前來請我贅幾句後言，一代大師的名作在前，後生小子如我，怎敢率爾操觚？祇不過，編者所選的這兩篇文章，恰好是胡先生曾經和我特別提過的，由而回想民國四十九年上半年，我幾度去南港中央研究院謁見胡先生，往事歷歷在目，令我不盡愴悼。尤其有兩次謁見，還有一件鮮少為人所知的尷尬事，因而決心趁此機會寫出來，以誌吾過。

民國四十九年元月，我創辦「作品雜誌」，得到胡先生極大的鼓勵和支持，從籌備「作品」創刊號起，我會不斷的勸着胡先生，請他老人家為「作品」寫一篇「創作」的稿子。在胡先生著書立說，探討許多重大的學術問題時，我所提的請求，如今想來，實在很不允當，可是，胡先生當時却並不以為忤，他每每慈祥和悅，謙沖自抑的這麼反問我：

「做了這些年的歷史考據工作，我還能寫小

說嗎？」

「當然能，」有一次我便這樣斷然的回答他老人家，同時，還「拿出了證據來」，我說：「先生「四十自述」的第一章，「我的母親的訂婚」，就是一篇最好的短篇小說。」

胡先生聽後，哈哈大笑，他很高興的告訴我：「我準備要寫「四十自述」這本書的時候，便有選十個趣味性比較濃厚的題目，用小說體裁描寫我太親切的感情，和太親切的環境的計劃，我認為這是自傳文學的一條新的路子，當我把這個計劃向朋友們一說，大家都表示贊成，其中尤以徐志摩先生的反應最為熱烈，他不時的催着我動筆，於是我就完成了第一章「序幕」，往後又陸續續續寫了幾章，然而，就跟你講的一樣，也許祇有這章「序幕」還可以勉強稱得上是「小說」，接下去的，不知不覺間又回到謹嚴枯燥的歷史敘述老路，因為，我畢竟是個歷史訓練深於文學訓練的人。」

「先生，」我當時表示抗議，我說：「您的

「四十自述」雖然還沒有寫完，可是，要談小說體裁，絕對不止「序幕」這一篇。譬如「在上海」的第二節，和「我怎樣到外國去」，不也是同樣的生動有趣而意味雋永嗎？」

胡先生莞爾一笑，忽然想了起來問道：

「「四十自述」那本書，你那兒有沒有？」

「我有大陸上出的舊本子。」

「那我送一本新的給你，」胡先生欠身而起，走向他的書房：「新本子上多登了一篇附錄：「逼上梁山」。」

我跟在胡先生的後頭，亦步亦趨，胡先生進書房，一伸手就從書架上取出一本遠東版的「四十自述」來，遞給我說：

「喏，就是這本。」

我却先不去接，得瞞望蜀的說：

「先生，順便給我簽個名，好嗎？」

「好哇！」

又是一伸手便從書桌上拿起一支筆，書攤在手上，胡先生很快的寫了我的名字，並且，落了款，寫好年月日。一直等到寫完了，他方始發

現——

「唔，不對，我怎麼用了紅筆呢？」

「這更好了，先生，」我趕緊從他手中將書接過，欣然色喜的說：「您讓我得了一件比較特殊的紀念品。」

胡先生用紅筆題贈給我的這一本「四十自述」，和蔣夢麟先生大病初愈，方回農復會上班，我去陪他老人家作了一次暢談，談得他老人家興緻勃勃，拿一本「新潮」題字送給我。當時蔣先生體力不會完全恢復，他寫字的時候手在顫抖，他一邊寫一邊懊惱的說：「抖得不成樣子，抖得不成樣子！」我便岔嘴說道：「這樣正好，您給我留下這次生病的紀念。」——蔣先生和胡先生同樣的揚聲大笑。這兩本書，一向放在我桌上書架的正前方，每當我讀書習作，身體困倦得難以支撐了，我便抬頭望望那兩本書的書背，憶起兩位老人家溫煦的笑容，由衷的關懷，無限鼓勵，我會一陣心酸，然後是精神一震，繼續埋頭書本與稿紙，再撐一段時光。

向胡先生要「創作」稿子要了兩三個月，有一天，胡先生直截了當的告訴我：

「你叫我寫小說，目前是絕不可能的。」

我便改口：

「請先生寫一首詩。」

「詩？」胡先生搖頭苦笑：「那是非得有寫詩的心情，才可以寫得出來的。」

幾乎就要絕望了，我仍鍥而不捨的請求：

「先生您找找看，有沒有以前不會發表過的詩？」

胡先生這才微微領首：

「嗯，這倒可以試試。」

還以為希望不會大哩，誰想胡先生一言九鼎，他確為「作品」花了不少功夫，翻箱倒櫃的找，果然被他找出了一首，寫成於三十多年前，而始終沒有發表過的新詩，那便是刊載於第一卷第六期「作品」、膾炙人口、傳誦一時的「三年不見他」。

胡先生的秘書王志維先生，特地打電話到「作品」雜誌社，告訴我這個好消息，使我興奮得跳了起來，當時便要驅車往取，王先生在電話裏說：

「你且等兩天，胡先生說過了要替你騰一逼。」

第二天，經過胡先生親筆贈過的「三年不見他」查來了，望着他那特製的稿紙，和端正的字迹，使我得了一個靈感。——自從胡先生為「作品」題的刊頭，製版刊出以後，也不知有多少朋友和讀者，稱讚胡先生這兩個字寫得太好了。胡先生為「作品」題的那夜，王志維先生和他在一起，他先寫了個「人」字傍，又寫一個「口」字，然後便援筆在手，一氣呵成，他不會再寫第二遍，因為他自己也相當滿意，以胡先生寫的毛筆字而言，這「作品」二字確是神來之筆。

由於胡先生抄給我的「三年不見他」，一共祇有四面，於是我想：與其排字，何不照像製版刊出呢？一方面可使讀者得一份胡先生的墨寶，另一方面在編排上也是一項新猷。

誰知道由於我這一念之「差」，居然鬧出了大笑話，使胡先生蒙上了寫白字的不自之冤，他老人家有口難言，我的罪咎更是無法自辯。

第一卷第六期「作品」付印之前，因為「三年不見他」是原跡製版，我祇匆匆看過四面接不

接得上頭，文字根本就不會看，這在我先後編了二十年刊物期中，真是空前未有的大荒唐事。我編刊物向來是從封面看到封底，我自己負責一字不漏的看二校和大樣，我的助手管「初校」與「三校」，這個原則是始終不變的，唯獨「三年不見他」有過一次例外，於是也就出了個大岔子。書印出來了，寄到南港的第二天，王志維先生便打電話來，通知我說：

「胡先生那首詩裏有了錯字。」

驟聽之下，我真是大驚失色，心想，這怎麼可能呢？然而王先生在電話中指點我，我立刻找一本一卷六期「作品」來看，一翻之下，糟啦！錯出在詩後面胡先生寫的一篇跋上，那篇跋第一句話便說：「章君毅先生要我尋一篇沒有發表過的新詩」，章君毅的那個毅字，左下角應該是「禾」字上加一小橫，但在胡先生的親筆原跡鋅版，印出來的却是一個「水」字，章君「毅」，就算我為此錯誤把筆名給改了吧，可是，連「康熙字典」上也沒有這個字呀。

胡先生寫我的名字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了，他老人家斷乎不會發生筆誤，可是，鋅版是從胡先生的原筆迹照出來的，照相製版不可能發生這樣的錯誤——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我和同事們反覆研究，實在想不出箇中緣故，苦思良久，終於，我的腦子裏閃過了一線靈光。

我立刻驅車趕赴製版廠，把製版的原件調出來一看，果不其然，毛病找出來了，決不是胡先生寫白字，而是——胡先生用的墨水顏色太淡，

筆劃照不出來，製版的技師莫法度，——我對於發稿文件的時間規定一向嚴格，他們爲了爭取時間，便去尋了一位「高手」，用一張透明紙覆在胡先生的原稿上，一筆一筆的描摹，這位「高手」描摹的筆迹誠所謂維妙維肖不爽分毫，偏偏描到「毅」字他一時看走了眼，把「禾」字誤作了「水」，使胡先生寫白字「證據確鑿」，蒙了有口難言的不自之冤。

當時「作品」的銷數大概是六千多份，錯誤發現之時，六千多本書全發出去了，收回既不可，改正更不能，黑字印在白紙上，這是永遠無法泯沒的證據，——胡先生把個極普通的「毅」字寫錯了，我帶着原稿，摹本和鋅版，到胡先生那兒去自承過錯——我太疏忽。

我知道胡先生平素待人從不疾言厲色，相信他不會罵我，但是我怕看到他作無可奈何的苦笑，然後一攤手說：

「錯都錯了，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」

然而，胡先生那一天却連這一句話都不會說，大概是他看到我懊惱沮喪的表情，他和往常一樣笑容可掬的和我談天。我方要說出自責的話，胡先生便故意打斷，或者打個岔來支開，時至今日我猶能回想自己那日的汗流浹背，如坐針氈。後來，輕描淡寫的，胡先生主動的提起這件事，他吩咐我說：

「還是去請那位描摹的先生，麻煩他把「毅」字所缺的那兩筆描全，然後再製一塊版，印它三五百份單張，讓我分寄給一些朋友。」

當時我以為這是胡先生想出來，「略資彌補」的好法子，不禁喜出望外，如逢大赦，心想胡

先生真是高明，印幾百份單張，分寄友好，不是可以說明他並沒有寫白字嗎？我欣欣然的答應，說是回臺北後立刻就辦。這時候，胡先生抬頭看了我一眼，話鋒一轉，又提起了他的那本「四十自述」，而且重述一遍他一生之中，唯一的一段「最荒唐而墮落」的生活，（其實，胡先生自謂的兩「最」，也不過是跟了幾位熱情豪放的朋友，打不計輸贏的牌，吃吃「鑲邊」的花酒，和大醉酩酊了那麼一次，跟巡捕鬧過一架，坐了半夜巡捕房而已。）我洗耳恭聽，發現他說那一大段時的語調若有所憾，但是也有幾分回味當年的輕微惆悵，同時使我有所憬悟：一個用功苦讀的年輕人，（胡先生幼、少年時期苦讀的程度，看過他「四十自述」的便了了，他的用功決不下於現代唸升學班、市初中、省高中，而能順利考進臺灣大學醫學院的標準學生，祇不過，胡先生當年完全出於自發自動，而現在的同學則多少要受到家庭、學校和環境的督促。）——在他十載寒窗，磨穿鐵硯之餘，偶然的一度發洩或癡癲，其實是基於一種潛意識的反抗心理，說穿了這是人之常情，恬不足怪，要在如何疏導和浚治，因爲，像胡先生當時這麼樣有定力「君子之過，如日月之蝕。」畢竟是不可多得。

這是我恭聆胡先生談他青年時期一段故事時的直接反應，另一方面，由於胡先生說這一段時興會很高，他講得十分生動詳盡，使我不用筆記也能清清楚楚的記得，因此，當那晚我回到家裏，來不及吃晚飯，我立刻便把「四十自述」拿出來，將胡先生所寫的和他所講的，在我自己的腦子裏加以對照，我想尋出，胡先生在下筆的時候

，是否有所保留，再則，我更狂妄的在想，根據我方才所聽來的故事，如果由我自己處理寫成小說，在角度上和表現上，能不能跟胡先生的那一章有所不同？我會苦苦思索，用多種不同的角度和表現方式，來寫同樣的一段過程，結果我欣然發現，胡先生寫小說的功力也決不是我所能望其項背的，而祇要他有功夫寫，他一定是我們這一代最傑出的小說家。

「胡先生寫白字」的一段公案就此了結，我爲了表示內心中的負咎，希望多寄些單張給胡先生的朋友，以及敬愛他的人，與乎「作品」的讀者，我用模造紙印了兩千份，一大部份送給了胡先生，一小部份則由「作品」雜誌社逕行寄發。

歲月悠悠，胡先生溘然長逝，至今忽忽六年了，每次，我藉赴中央研究院看書之便，每每到胡先生的塋地，獻一瓣心香，灑兩行熱淚，向長眠地下的他老人家，行三鞠躬禮。然後，我便在胡先生墓園，通往董作賓先生牛眠佳城的那一條小徑上，揀一處平坦的地方坐坐，看天上白雲冉冉，聽舊莊園那些小朋友們的琅琅書聲，在那時候我會覺得胡先生離我很近，我彷彿又接觸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，祇是我的眼睛有點濕潤。——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全天候讀書習作，焚膏繼晷，緊張忙碌的我來說，這便是我全身心最寧靜、最舒坦的時刻。

今年二月，展拜過胡先生的墓園之後，信步又走到了「胡適紀念館」，驚喜交集的見到王志維先生，一杯茶，一支煙，我和王先生在他那儘可旋身的小辦公室裏促膝長談。前塵往事，在王先生和我之間起一層氤氳般的愴涼和惆悵，我談

起耿耿于懷，八年於茲的那次「白字事件」，王先生想了起來告訴我：

「你那次印的單張太多了，現在還有好些存在紀念館裏呢。」

畢竟年齡長了八歲，我恍然大悟，當年，胡先生何曾為那件小事介意？他要我印那些單張，真的是為了送送好朋友而已，他何須乎去向朋友聲明，拿出證據來，證明他那個「穀」字其實不會寫錯。一切的一切，都是我自己在大驚小怪，庸人自擾！

倒是，胡先生那天看得出我的負疚良深，踉蹌不安，他為了怕我僵窘，怕我慚惶，因而份外的溫藹，特地挑些親切而輕鬆的話題來談，「春風風人，夏雨雨人」，正唯有胡先生無微不至的在身體力行。八年以後方始弄清楚胡先生對那次「白字事件」的態度，使我驟感當時自己的愚昧，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」，像胡先生這樣博大精深的一代完人，即使要景仰崇慕他老人家，自己本身也得有相當的深度。

那晚，乘雨歸去，走了一站，幸而遇見南港十三輛三輪車中的一輛，花五塊錢，請他送我去搭公路局車。途中經過一處水窪，不巧有一部大型轎車風馳電掣而來，輪飛處，濺了三輪車工友一身的泥水，我說您還是停下來措措吧，三輪車工友一時氣忿，破口大罵：

「神氣什麼！數你是中央研究院的，你文章學問再高，總高不過咱們胡院長吧！」

「咱們胡院長」？聽得我心裏暖融融的，一路上，儘找話跟三輪車工友聊，他的話匣子打開了，高聲嚷嚷着跟我說：

「先生你不知道，咱們胡院長在世的時候，人家是七十幾個博士，也坐小包車，可是他每次遇見下雨，經過有水的地方，碰到車過人過，咱們胡院長準定要關照司機，慢慢的開，甚至停下來，別讓泥水濺着了人家。」

我好奇的問：

「您見過胡院長？」

「沒有，」他直率的回答：「不過這話可是他那位司機大哥親口告訴我的。」

為了探測他內心中對胡先生景仰到甚麼程度

## 編後記

△鈕先銘先生的「還俗記」，雖然是寫他自己在日寇侵華時期的艱險遭遇，但也暴露了當年日本軍閥虐殺中國軍民的獸行，與劫後各地慘狀。人心不死，暴政必亡。在日寇的暴政下，中華兒女的奮鬥精神，更為之發揮無遺。以此證今，益信共匪覆滅之日，已為時不遠。

△中華全國體協理事長前貴州省主席楊森將軍在「貴州雜憶」續文中，以他數十年閱歷，敘述馬的品種與習性，不僅為經驗之談，抑且還有許多寶貴獨到的見解，足供養馬者和愛馬者的參考。謹介紹給中外讀者一讀。

△本刊發行人王成聖教授每期所寫有關

，我這個彎子問：

「您怎麼就知道方才車裏坐的先生，學問文章不及胡院長高呢？或許人家也是得了好些個博士學位的呀。」

「呸！」他竟輕蔑的啐了一口，冷冷的說：「就憑他這麼只顧自己不顧別人，他的文章學問能够高到哪兒去呀！」

旨哉斯言，使我恍然又上了一課，我留戀的再回頭眺望胡先生的墓園，霏霏細雨遮不住，青翠山峯又逸出雲靄之外。

編者

石達開的歷史故事，膾炙人口，成為讀者不可一期或缺的讀物。本期所寫「石達開風掃落葉定江西」，除對石達開以雷霆萬鈞之勢底定江西有詳細的描述外，並對石達開的治軍作人有更進一步的剖析；石達開以個人的威望，堅定了三合會六、七萬烏合之眾的信心，不經整訓，即能指揮調遣運用自如，使之成為軍紀良好，作戰驍勇，素質幾與太平軍相埒的一支大部隊。此種神跡，非翼王馬克臻此！此外對會國藩的大度能容，用人唯才，不計個人恩怨利害的領袖才具；對左宗棠的剛直絕俗，一絲不苟的性格，均有深入的描述，值得一讀再讀。

X X X X